

彭兆荣 牟小磊 刘朝晖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文化特例

10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

中華書局出版

文化特例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文化特例

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

彭兆荣——牟小磊——刘朝晖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责任编辑 吴家莘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夏顺利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特例

——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

彭兆荣 牟小磊 刘朝晖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38 千字 5 插页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221-04094-X/C·48 定价:14.40 元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吴家萃

执行主编 徐新建

编 委 吴家萃 吴秋林 余未人 张建军

徐新建 奚晓青 章海荣 潘年英

总 策 划 余未人

貴州高息民間
文化寶庫打開山
門通向世界

費芳通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清同治二年
(公元 1863 年),
瑶麓瑶民立“婚
姻改革碑”,这是
现存瑶麓最早的
石碑。



1987 年,瑶
麓瑶人在建好引
水工程时立下的
碑文,石碑背面
有保护水渠的公
约。





瑶麓“仙人洞”(即岩洞葬)洞口。



瑶人棺材上的几何图案和木刻鱼。



瑶麓氏族的石供“菩萨”。



传统的“干栏式”建筑越来越显其弊病。第一层为牛栏，小孩却在楼梯上吃饭。



女性胸前挂着的银饰小鸟。



1938年,著名华侨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资建成瑶麓民族小学。像片上的是学校的牌坊门。

内 容 提 要

些年来,瑶族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类学界的关注。瑶族的文化变迁、现代化进程及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迁徙的范式、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等,都成了当代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热心探讨的内容。

本书是在对贵州省荔波县瑶麓青裤瑶进行两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微型社区研究的专门著作。本书不囿于严格的民族志体例;材料翔实,却又不失对理论性的强调;村落虽小,却又不失宏观和中观的透视与把握。它既向世人展示了青裤瑶独特的“风俗画”,又具有人类学研究的当代性、普遍性。

Summary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Yao people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particular concerns from either the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circles of anthropology. Its cultural evolution,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differ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mingling with other nationalities, and migration are highlights i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s by anthropologists, nationalists, linguists and historians.

Based on two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the Yao Li Qingku Yao (Yao in black trousers) in Libo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is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details and also from a theoretical angle and not confined strictly to a local record of ethnic groups. Besides, it shows to outside their paintings of the local ethnic customs.

This book is of modernity and universal truth.

• 目 录 •

绪 论 民族确认与民族研究的关系问题	(1)
第一章 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背景	(21)
第一节 生态环境	(21)
第二节 人文历史背景	(27)
第三节 小结	(31)
第二章 人口演变	(34)
第一节 历史上的人口变化	(35)
第二节 人口现状	(42)
第三节 小结	(55)
第三章 农业生态系统	(62)
第一节 狩猎	(63)
第二节 农业生态系统	(75)
第三节 小结	(92)
第四章 瑶麓的家族	(94)
第一节 家庭/家族的型态与经济大权	(95)
第二节 继嗣与分家:家族的分化	(119)
第三节 东方的追忆:家族与祖先崇拜	(129)
第五章 瑶麓的婚姻与生育	(140)
第一节 婚姻制度、形态及相关因素	(141)

第二节 舅权:婚姻的交流	(150)
第三节 浪漫神秘的恋爱之旅:凿壁谈婚制及其衰减 趋势分析	(156)
第四节 妇女生育状况	(169)
第六章 瑶麓的社会组织(1800—1949 年)	(175)
第一节 1949 年前传统的瑶麓社会组织	(176)
第二节 血缘集团:氏族组织	(182)
第三节 准地缘集团:族群组织与制度化 的社会控制	(186)
第七章 社会地位与角色	(196)
第一节 老与少	(196)
第二节 男与女	(203)
第三节 名与实	(211)
第八章 认知与象征系统	(219)
第一节 青裤瑶的认知系统	(220)
第二节 青裤瑶的象征表述系统	(233)
第九章 文化变迁	(243)
第一节 文化变迁的因素	(244)
第二节 我是我与我非我	(252)
第三节 指导性变迁	(262)
第十章 宗教里的两位世界	(269)
第一节 宗教的双位规则	(269)
第二节 仪式的解读	(278)
第三节 抗拒生命的时空观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298)

—— 绪 论 ——

民族确认与民族研究 的关系问题

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做研究,通常是将族源的讨论放在第一章,以建构历时性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也不例外,将族源问题放在前面,但不是第一章,而是第一章的前面——绪论。作者并非有意要标新立异,或企图创造一个新的写作体例,实在是因为自己在进行民族研究的有限经历中,窃以为横亘着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民族确认与民族研究的关系问题。民族确认说起来似乎并不复杂,深究起来,或换一个角度去透视就变得很不清晰,经常令人迷惑不解。而从事民族研究,则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将影响到整个民族研究的质量。

一个成年人最明白地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在什么时候?是他用最经济扼要的文字在履历表上填写诸如姓名、性别、民族、籍贯、出生地点及时间等项目的时候。每一次填满履历表中的空格就是一次笔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既向他人确认,又在自我的心理提示下自我确认。而这种对人对己的双向确认的文字内容又最为普通且没有任何歧义。然而,这种最为寻常、普通的身份确认又常常处于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即自以为确认已准确无疑之际,恰恰可能是最让人糊涂之时。对人、对己都如此。

在中国,早先的“民族”更多实指“种族”(Race)意义的族群,并结合着地域和方位的、以某一主体民族为主导的认知。中国古老的

宇宙结构模式——“一点四方”，即以中央为一点向四方辐射扩张。《庄子·应帝王》说：“中央之帝为浑沌。”浑沌是哲学的“原道”，故华夏始祖构制宇宙世界时便如此这般地将自己定在“中”点上，中国、中华、中州、中原等皆循此意而命名之、确认之。是为宗、为道、为原、为元。相对于“一点”，就有了“四方”——东西南北。“四方”是次要的，是派生的，是从属的，是亚类。《尔雅》注云：“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于是，相对于方位而言，“一点”为主，“四方”为辅；前者为文明，后者皆蛮荒。中国哲学发生学上的这种沙文主义味道长久地弥漫于“文以载道”的叙事传统之中^①。

很显然，“一点四方”是对“唯我”（汉族）以外不同地域其他族群的规定，在族群之间划分出了距离。而与种族发生相同的情形是，“民族”也是个外来词，其能指与所指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距离。“这些英文词都在不同程度上曾经在‘误读’与误用中与血缘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它们虽然最初建立在生物学的血缘纽带，并且与之并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后来，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日趋松弛，甚至发生质变，因为‘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外族包括血缘在内的各方面交流的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血缘意识以及建立在血缘意识之上的先族意识越来越成为‘民族’意识的主要内容，并逐渐脱离原来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纽带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②

不言而喻，“民族”又是一种政治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名称与某一个族群放在一起时，族群中的民俗性便时常为政治色彩所冲淡。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oine)认为：“在中国，民族的族群关系变成了一种政治”^③……按此线索，民族便与

① 参见《西南研究书系》总序，徐新建文。

② 纳日碧力戈：《种族与民族观念的互渗与演进》，参见1995.7.“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材料。

③ 参见“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Edited by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Hong Kong，1989，P9.

国家政体息息相关。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的政治性指喻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从政治角度来处理民族事务、制定民族政策，事实上成了一种“传统”。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①由此可见一斑。

民族确认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迄今仍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即使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人言言殊的层面。利奇(Edmund Leach)早在1954年就对缅甸高地的克钦(Kachin)族进行过著名的研究，他认为民族应从相对于其他社会族群的结构功能来确定^②。自利奇之后，一批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类学家都曾从族群关系的角度探讨过民族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巴斯(Fredrik Barth)的观点。他认为民族确认的终极依据应当是当事人自己，换句话说，应当是某一族群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族源和背景自己来确认^③。最近的有关民族和族群确认的研究趋势基本上沿着这条线索，将投视点放在某一个民族或族群内部对自己文化的解释和运用上^④。当然，其中又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确认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维系在一起的，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也同样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复合的多族群系统，其价值体系也是建立在多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之上”^⑤。一言以蔽之，民族确认的最重要的支撑点是一个族群中的人们自己对自我民族性的认识 and 把握。其他任何标签式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3页。

② 参见 E.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Cambridge, Mass., Hav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③ 见 “Ethnic Adaptation and Identity”, A Publication of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Philadelphia, P3.

④ 见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dited by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 Hong Kong, 1989, P12.

⑤ 见 Edited by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9, P19.